

明代的幼科醫學

熊秉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前言

中國傳統醫學中的幼科或兒科，於唐宋時期初萌，至明清兩代已粲然可觀，其間有明一朝的發展實屬關鍵。本文即擬以明代幼科中最重要的四部文獻為主軸，參以其他相關材料，試圖分析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兩百年間傳統幼科醫學發展的軌跡，以略釋其學旨特色，主要的方向，背後的動力，兼及幼科醫學發展與幼科醫護工作之關係，期望從而一窺傳統中國醫療文化與民衆健康景況之一斑。

二、明代以前的中國傳統幼科

在世界諸多古代文明中，中國的幼科醫學算是萌發較早的一個例子。除去上古時期許多名存而實佚的兒科著作之外，如今可見的兒科論著已可上溯隋唐。不過中古的幼科與傳統醫學中其他科別的狀況一般，規模粗具而不脫巫醫之色彩，相傳爲巫妨氏所著的顛顛經一書很可以代表這個特色。不過顛顛經作者雖稱巫氏，但以「顛顛」名幼科亦已顯出當時醫學知識在此領域中所具實證之精神。¹

1 顛顛經據謂中古巫妨氏所著，一般認爲是唐末宋初的作品。是現存較早的一部幼科專書。顛爲頭骨，顛意腦蓋，小兒初生之際顛顛未合，其生理病理亦與成人相異，該書乃以顛顛經名

同一時期年代稍早的其他醫籍中，則早已將有關小兒健康的問題專置一處。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即將小兒的問題專置一處。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討論幼兒疾病的六卷，二百五十五條即為名例。孫思邈所著千金要方中的少小嬰孺方二卷，更列卷首。這兩部隋唐時期的醫學典籍中所涉幼科，一方面對新生嬰兒的照護，如斷臍、拭口、沐浴、哺乳、衣著等作了詳細的說明，一方面對當時常見的小兒疾病，其病因及症候、治療也提出了他們的看法。² 同此傳統之下，王焘所作外臺秘要四十卷中也有兩卷八十六門是專談小兒疾病問題的。後來唐、宋、金、元的醫學大家，其著作中許多兼及幼科，且將其獨立列於篇首或篇尾，使其自成單元，習者方便查考，也可說是鼓勵幼科走向專業化的一個先聲。更重要的是，這些部分醫學材料，因作者及其全籍均負盛名，而流傳廣被。尤其是孫思邈的少小嬰孺方二卷，以類似單行本的面貌為多方傳抄，歷經唐宋元明，仍是醫家及民間珍視的寶藏。³

不過整體來說，終唐之世，幼科本身的發展所受知識上的局限性仍然很大。當時的醫書也承認他們的能力也許僅止於「卜壽夭，占生死」。而且一般而言，對於六歲以下稚齡兒童的健康問題，他們所悉不多，年幼的孩童一旦染上惡疾，當時醫界大半束手無策。⁴

然而，傳統的醫學界並未放棄對改善幼兒健康上的期許及努力。此殷切期望和實質的努力，日積月累，未嘗間斷，由唐而宋，果真於北宋中葉紛綻奇葩。其中最重要的，自屬錢乙（1032年—1113年）及其所留下的小兒藥證直訣一書。據劉跂為他所寫的傳記，錢乙自己出身於錢塘的世醫之家，他的父親和養父都以醫為業。當時為醫本屬方技術士之流，一向有父子相傳，師徒相授的傳統，因而錢乙稍長也就讀書而醫，順理成章地成了一位民間醫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成年後就以「顧顛方著山東」。⁵ 也就是說，到十一世紀中葉左右，在中國已有專治小兒的幼科醫生存在，幼科醫學發展的

幼科醫學之旨。目前所見之本，為四庫全書所輯錄。

2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南京中醫學院校釋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年）下册，卷45—50，頁1237—1392。孫思邈，千金要方（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三八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3 少小嬰孺方二卷，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書室藏。

4 參見古今圖書集成幼科，卷五〇一。

5 劉跂撰，錢仲陽傳。見錢乙小兒藥證直訣（臺北，力行書局重印），前附。四庫全書目錄提要中亦謂：「乙在宣和問以巫方氏顧顛經治小兒，甚著於時」，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三八册。

客觀條件較前又進了一步。⁶

在此環境之下，乃有錢乙一生的事業，而錢乙個人的成就更把幼科醫學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首先，錢乙自己因治療皇族子女而奉召入宮，並獲擢為太醫丞。「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顧致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⁷ 如此一來，不但錢乙本身以幼科權威聲名大噪，而且幼科這個專業在整個醫界也受到特別的敬重，幼科醫學和幼科醫生兩者在社會上的地位都得到新的肯定。而對後世而言，最重要的，是此一階段的發展能以一部兒科專書的形式，留傳了下來。幾近千年之後，錢乙因被尊為中國幼科的鼻祖，小兒藥證直訣更成為界定中國傳統幼科醫學之特質與方向的一部主要文獻。

與錢乙同時及稍後，兩宋還留下了其他幾部幼科名著。如董汲專論痘疹的小兒斑疹備急方論一卷，⁸ 劉昉所編的幼幼新書四十卷（1150年），陳文中所著小兒痘疹方論（1214年），乃至十二世紀中有小兒衛生總微方之出。⁹ 這些作品的出版，顯示幼科在宋代以後日益引起醫界的重視，幼科醫學也日益走向自成專業的步驟；這些發展與錢乙及小兒藥證直訣的貢獻很有關係。當然，錢乙以業醫出身，他的醫學亦有源有本，他在幼科上發揮的學理（如五臟證治），所採擷的藥方（如六味丸），與中國自古的醫學傳統（如金匱要略）有十分清楚的傳承關係。但是經由他的鑽研發展，更釐清了幼科這個專業的特質和努力目標，在診斷施治的理論與方法上都有了可循的規則。他同意傳統醫家的意見，認為幼科是醫界中特別困難的一個領域¹⁰，但是在

6 劉歧的錢仲陽傳中述及大概經過，以「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論，且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未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愈。』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出處見上註。

7 同上註。

8 董汲小兒斑疹備急方論（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書室藏）。

9 中國幼科在上古到南宋的大致發展，可參見陳邠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史仲序中國醫學史（臺北，正中，1984年），陳聰榮，中醫兒科學，（臺北，正中，1987年）及汪育仁編，中醫兒科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小兒藥證直訣原序中起始即謂：「醫之為藝誠難矣，治小兒為大難。自六歲以下，黃帝不載其說。始有顛顛經以占壽夭死生之候。則小兒之病雖黃帝猶難之，其難一也。脈法雖曰八至為和平，十至為有病，然小兒脈微難見，醫為探脈，又多驚啼而不得其審，其難二也。脈既難憑，必資外證，而其骨氣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不常，其難三也。問而知之，

知識和技術上他也決定要面對這個難題，希望醫界其他同仁能與他一同接受挑戰，以拓荒的精神去一步步征服當時醫學的這一片處女地。以期「使幼者免橫夭之苦，老者無哭子之悲」。¹¹ 在醫理上，錢乙把臟腑學說應用到幼科方面，其所闡述的「五臟證治」到明清時期仍是傳統幼科醫學的根本基礎，而他所揭示的小兒「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之特性，更成了傳統幼科奉為圭臬的名言。在診斷方法上，他發展出的「面上證」，「目內證」等着重望診的辦法，對後世的醫者啓示也很大，後來不斷有學者朝這個方向作進一步的推敲和發明。

總之，到了兩宋，幼科之雛形已成，及至明初，幼科醫家所要努力的是如何把這個專科在學理研究和技術發明上都更上層樓，並且把這個專業化的成果推廣開來，使福澤均霑。以下，我們可以從明代幼科的四部代表性作品為出發點，分別探討明代幼科醫學在普及化，專業化，及整理研究方面的成果，並兼而論及當時中國政府在推動醫學發展上的特殊角色。

三、嬰童百問與幼科醫學的普及化

明朝的嘉靖年間，也就是十六世紀初，吏部尚書許讚向朝廷呈進了一部麗泉堂所刊的幼科醫書，書名嬰童百問，共有十卷。許讚在進呈此書的疏中說，他是在身為翰林編修時於坊間蒐得此書，為「在昔名人著述」，故日後傳本有以「不著撰人」刊行者，但查勘原書，卷一之下題有「魯伯嗣學」字樣，故亦有以魯伯嗣為作者之名而流布者。

醫之工也，而小兒多未能言，言亦未足取信，其難四也。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又所用多犀珠龍麝，醫苟難辨，何以已疾，其難五也。」在這篇分析裏，原序作者閻季忠代錢乙表達了他們師徒兩人對當時幼科醫學的看法。以錢乙當時為幼科大師的地位，他這段陳詞寓意實深。在他的評量下，中國醫學發展了一千多年，然而對兒童健康的瞭解仍然粗陋，他特別提到黃帝內經中對六歲以下兒童的問題完全付之闕如，使得後世的醫者在學理上毫無權威根據可循。幼科在十一世仍是中國醫學知識和醫療工作上的一個死角。而且在技術方面，傳統的診斷方式，不論是望、聞、問、切，遇到了孩子，執行起來也都有困難。在治療方面，兒童以柔稚之體，一則病情惡化極速，二則用藥不易掌握，在生理上變化難測，在病理、藥理上也常不禁摧殘而致意外。這些情況是當時深涉幼科者共同的感想，故傳統醫者有「寧治十男子，不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不治一小兒」之說。

¹¹ 俱見閻季忠小兒藥證直訣原序，錢乙，前引書，頁1—2。

不論如何，此書價值的重點在其內容與結構。因為誠如其書名所示，這部幼科醫書是以問答的方式撰成，以嬰童各證設為百問，就當時醫界知識技能所及，分別作答。「每問必究其受證之原，每證必詳其治療之方，觀形審勢，因病投藥，相當詳備」。¹²

考嬰童百問一書之內容，兼有「嬰幼童之養護」與「疾病療治」兩大部分，前者多承唐代巢氏，孫氏之作，後者則採述錢乙之直訣而加以發揮。在養護方面，像卷一所及：一問初誕，二問護養法，三問噤風撮口臍風。其中所談的初生用硃蜜、黃連、甘草等法，護養時不當煖衣，宜頻見風日，乳哺時當注意節制，「不可過飽或積滯不化」，以及講求斷臍技術，以避免臍帶感染，造成「臍風」（新生兒破傷風）等等，這些論點，大致與清唐巢氏、孫氏醫書中的育幼部分相符。其中，亦有可上溯魏晉葛氏肘後方，或下涵宋代陳氏幼幼新書範疇者。其他各卷中亦有討論嬰幼兒「發育」（development）與成長（growth）的一些相關問題，如卷四，三十一問胎疾，三十二問解顛，卷五的四十一問語遲，四十二問龜背、龜胸、鶴膝、行遲等等，均可見嬰童百問的作者，對傳統醫籍，尤其是幼科方面涉獵甚廣，其學養蓋非尋常之輩可及。¹³

在幼科疾病方面，嬰童百問很明顯地接受了錢乙的理論和療法。從診斷上所用的脈法、面上證之重氣色、目內證之重神采，乃至五臟證治，及對驚疳、吐瀉、傷寒、諸熱等等問題的看法，大致都遵循了小兒藥證直訣的啓示。有些部分當然增添了一些作者本人的意見，及當時醫界的經驗，亦有較宋代幼科更詳盡的發揮，更清晰仔細的論證。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此書寫成的形式與體例，較原書的內容也許更具深意。因為全書以問答的方式完成，每設一問，必有論、有驗、有方。其問答以淺顯易懂的文字為之，其論簡明扼要，其驗確實有據，其方條理分明，作者普及幼科知識的用意，及書刊後嘉惠遠地民衆的功用，不言可喻。

任何一個學科或專業，於其發展的過程中，研究發明與普及推廣兩者必須交相為用，於是此學科或技術乃得又深又廣，光輝燦爛，有體而有用。由嬰童百問一書之出，我們可以認識到中國傳統幼科，經隋唐兩宋到金、元、

12 見吏部尚書許謙進嬰童百問疏，魯伯嗣嬰童百問疏（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原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年重印）。頁5—6。

13 見魯伯嗣，前引書，卷一、卷四、卷五。

明的發展，已有足夠的深度與內涵，並且也有人意覺將此專門知識普及化的需要。此書初刻見於陝西藍田，再由官方大吏疏而進之，以朝廷之力大為推廣——如今所見的嘉靖刊版前面除了有吏部尚書許讚之疏，首頁並冠有大學士嚴嵩之序。¹⁴ 如此一來，作者著此「普及本」的心意乃大白天下。而嬰童百問一書的功能亦得大顯於世。對知識技術的傳播而言，此書以問答的體裁，把數百年幼科醫學的成果，以有組織且淺顯的方式呈現讀者眼前，盡此十卷百問，當時中國傳統幼科的範疇及短長，一目了然。對該書的讀者而言，不論是習醫者、行醫者得而參考，或士民之略識醫理者善以自用，此書確已達成廣佈幼科專業知識之功。至於將醫術普及民間之一事，「百問」之體固為一端，後來亦有醫學之他科仿此而作「婦科百問」等等，足見嬰童百問之體自有其價值所在。而同時代或稍後其他醫家亦不斷嚐試以其他體裁，如歌，如賦，如訣等更利口耳相傳的方式，意圖將醫學知識與技術迅速而廣泛地在中國文化圈中流傳開來。¹⁵ 到王肯堂之證治準繩問世，全書完全以歌訣韻語的形式寫成。¹⁶ 清代各種湯頭歌訣之類的作品，其實都可以說是繼嬰童百問這類作者的後起之秀。這些努力，彌補了當時中國社會中識字者少，普遍教育程度暫難提高的短憾，使醫學與健康這種全民急需的知識，能用淺白口語問答或押韻口訣的辦法，散布全國各角落，社會各階層，這一層功夫，對儘速解決中國的疾苦，改善全民的健康，誠然有不容忽視的意義。當然，宋明以來刻板印刷的普遍化，及國內刻書，售書網絡之蓬勃發展，對專業知識的迅速普及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萬氏幼科與幼科醫學的專業化

傳統中國的醫學雖亦有其學術上的傳承，但行醫者多半被歸於方術者流，屬於「工匠傳統」(craftsman's tradition)的成份多，而被尊為「學者傳統」(scholar's tradition)的成份少。¹⁷ 清朝以前，歷代的醫籍均見

14 俱見許讚，前引文。

15 例如萬全，幼科發揮中的入門審候歌，小兒正訣指南賦等，見幼科發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卷一，頁4—6。

16 王肯堂，證治準繩，（文淵四庫全書767—77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

17 參見拙文，「清代中國兒科醫學之區域性初探」一文，見中國近代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子部而不入經部，二十四史中醫藥者之傳記材料均屬方伎傳，或術士之流，醫學及醫者在舊日社會中的地位可見一斑。在此社會與文化的背景之下，醫學知識的傳授，及行醫職業的傳遞，也就沿襲其他卜巫星相工藝等方伎之士的傳習辦法，或為子父相繼，或為師徒相傳。不論子父相繼或者師徒相傳，如果其術業能一脈相傳，歷數代而不衰，則知識與經驗得長年之積累，對該項學科或一種技術的「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可能有所助益，傳統中國的醫療文化亦復如此。¹⁸

若從此角度出發，觀察宋元以後幼科醫學在中國的专业取向，我們會注意到一個特出的例子。早在十四世紀初，就有一個原籍江西豫章（今南昌）的姓萬的醫學世家，他們世代業醫而專精小兒，一世祖杏城翁在世時即「以幼科鳴」。杏城翁後來早逝，遺孤菊軒翁決意「繼其志而述之」。經其經營，「其術大行，遠近聞而論之萬氏小兒科云」，是為萬氏幼科之第貳世，也就是日後幼科發揮作者萬全的父親一輩。萬菊軒先生去逝之時，其子萬全已讀書識事，遂念及「幼科之不明不行也，前茶作者，雖善弗彰，后無述者，雖盛弗傳」。他為了彰顯先人的成就，廣傳萬氏幼科的內涵，乃於暇日，「自求家世相傳之緒，散失者集之，缺略者補之，繁蕪者刪之，錯誤者訂之」。萬氏幼科數代家傳之知識心得，經他一番集補刪訂的功夫，成了一本精湛的幼科專著，名為育嬰家祕。不過當時他編書的用意，還僅僅在「以遺子孫」，這已是萬氏幼科第三世的作為。不意萬全雖有十子，却沒有一個孩子能善承家緒，續行幼科。當萬全年入老邁，眼見一方面家祕之書廣泛流傳行荆、襄、閩、洛、吳、越各地，引得廣泛地讚揚和迴響，「莫不曰此萬氏家傳之小兒科也」，另一方面，又自忖家中諸子無人能接掌祖業，百數十年的心血可能就要付諸東流。萬全兩方衡量，反覆思索之下，作了一項寓意深遠的決定，他決定再作一書，進一步闡明萬氏家傳兒科之祕，將此知識與經驗的寶藏從此公諸於世，這就是目前仍然可見的幼科發揮四卷。

由育嬰家祕而至幼科發揮，明代的幼科無形間往「醫學專業化」的方向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如萬全本人在幼科發揮卷首所留下的「敘萬氏幼科源流」所言，當他以數代幼科權威的傳人，決定為醫學學術之流傳跨出這歷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7年），頁17—39。

18 亦可參見 Paul Unschuld, *Medical Ethics in Imperial Chin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史性的一步時，他心中想的是：「余切念之，治病者法也，主治者意也，擇法而不精，徒然法也，語意而不詳，徒意也。法愈煩而意無補於世，不如無書。又著幼科發揮以明之者，發明育嬰家祕之遺意也。」一個專科，從講求技術上的「治病之法」到追求學理研究上的「主治之意」，是專業化的表徵之一。一個專精幼科的家族，慨然將其家藏之祕，刊刻流布，並再著專書以闡明其背後之「遺意」，旨在將此專科知識技術由私傳的性質，轉而公諸於世，這是專業化的表徵之二。從此知識財產的所有權，由萬家子孫徒弟，轉而屬於天下所有的「後世君子」，變成了天下公器——「學問」的一部分，這是專業化表徵之三。同時，子父相繼，師徒相傳階段時所可能帶有的「口傳文化」的傳統（oral tradition），也經過刊布天下之蛻變而成了「文字傳統」的一部分（literary tradition）。隨着文字流布，知識之傳播範疇較前時擴展許多，知識的力量也較昔日增強不少，這是專業化表徵之四。用萬全自己的話說：「吾不明，后世君子必有明之者。不與諸子，恐其不能明，不能行，萬氏之澤，未及肆世而斬矣。與門人者，苟能如尹公他得庾公，斯而教之，則授受得人，夫子之道不墜。若陳相雖周孔之道，亦失其傳也，諸賢勗之哉。」¹⁹從這番話，以及「幼科發揮序」言中所謂：「萬氏于此道至焉哉。廣嗣者弓禡者皇皇焉，而幾得之，已痘者治皇皇焉，而幾得之。……斯書成人之命，所必欲得者，與不得之于萬氏。……手徒其徒，命曰家祕。不佞奄有赤子之邦，不以廣而傳之，是蔽造化之大慈，而不能得之于萬氏者，無以得之于天矣。不佞又不以歸萬氏，而歸之冥冥有神授之者，庶幾附于如保之意。」²⁰從這一篇話中，我們見到一個專業在道德理想上的提昇，由權衡私利轉化成獻身公德，由盡人事而念及行天理，這一層倫理境界的昇華，這是專業化表徵之五。

萬氏幼科所行過的軌跡，雖謂特出，但不為孤立。長江中下游是那個時代人文薈萃，又是全國藥材集散之所在，萬氏幼科之衍盛，固有其背景，但是當時各地亦可見類似的例子，當時幼科名醫輩出，幼科醫籍競相問世，而且痘疹科自成一套專門學問，像聶尚恒活幼心法中對痘疹的分析細微，是另一個明證。這類家祕紛出，公傳天下的風氣，是明代幼科醫學專業化的具體表現，而其所形成學識交流，技術競爭的環境，更是刺激傳統幼醫學更上

19 均見拙文「清代中國兒科醫學區域性初探」一文。

20 見萬全幼科發揮序，前引之書，頁5。

層樓的有利條件。

五、政府與太醫院的貢獻——薛氏的「保嬰全書」

與世界其他文化中的醫學傳統相較，醫學文化或醫療工作在中國的發展與政府的關係特別密切。由上古、中古、而近代，中國歷朝的政府對醫學的發展和醫療的推行，表現出較高的興趣，負起了較大的責任，也因而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對中國醫療文化的歷史發生了相當的影響。²¹ 在明代幼科醫學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也許可以用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所出版薛鎧、薛己父子所著的保嬰全書作為一個說明的實例。

明朝正德、嘉靖年間以幼科著名的薛己，是江南蘇州府人，其父薛鎧亦長醫術。薛己本人，據說「性穎異，過目輒成誦，尤彈精方書，於醫術無所不通。」²² 正德時，被選為御醫，後擢南京院判。嘉靖年間，被進院使。其父薛鎧，亦得贈太醫院院使之頭銜。薛氏父子的醫名，與薛氏醫案十六種（1529年）及保嬰撮要（1556年）、保嬰全書之刻，有直接的關係。而就明代幼科醫學而言，從保嬰全書之刊刻流傳一事中，亦可以窺及朝廷、太醫院，和政府對傳統醫學發展的貢獻。

傳統中國政府對醫學發展的貢獻，可分三個層次來討論，即觀念的，制度的和社會的三個方面。在觀念的層次：因儒家思想之主導，傳統的中國朝廷有保赤民以保天下的說法，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天子和宮中大臣因保土而有保民之責，提倡醫學，刻印醫書，施藥濟民，廣義地來說都是皇帝以天子之身克盡撫育赤子厥責的一部分。正如都察院御史王緝為萬曆刻本保嬰全書序言中所謂：「書曰如保赤子。其在兵法曰，視卒如嬰兒，可以與之赴深谿。今天子神聖，海不揚波而猶然軫念。而公（中丞趙公）也，以赤子之保保民，以嬰兒之撫撫卒，卒之四境晏如，民免橫夭。譬之去醫藥，出肘上之方

21 參見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a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aul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ess, 1986), 趙璞珊, 中國古醫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及拙文「清代中國兒科醫學之區域性初探」。

22 見蘇州府志，亦參考史仲序，前引書，頁130—132。

，隨試輒效，其仁覆寰寓，又豈直全嬰也哉。」²³ 這一番說辭，很可以表現出其背後的思想傳統。而實質上，唐、宋、元、明、清各朝官方所主持的醫書編纂，對醫學教育的推展，醫療工作的改善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醫史上最最重要的幾部集大成的醫書，如宋代的太平聖惠方（992年），聖濟總錄，明朝的普濟方、永樂大典，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1723年）醫部全錄五百二十卷，及稍後的四庫全書子部醫類，都非帝國政府的雄厚財力，人力資源即不可為。除了編纂大部醫書，朝廷還提倡醫學教育，推動醫政制度，設局施藥濟民，這與世界上同時期的其他地區政府相較，是一個極其難得，而特色鮮明的一個例子。薛氏保嬰全書在明代數次刻印，都是此背景下的產物，而此書之刊布流傳對明代幼科醫學也的確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傳統中國政府對醫學發展上的貢獻，其第二層的關係是制度的層次，尤其是太醫院的價值。這在宋、明兩代的影響尤其深遠。中國歷史上中央政府中醫政、醫教部門的設立甚早，即不論先秦漢魏之制，唐之太醫署，宋之太醫局，與明之太醫院，都有「少小科」，或「小方脈」主持幼科方面的宮廷醫學教育，並職司部分相關的醫政管理。對整個醫學和醫療的發展而言，經由太醫院的功能，政府可具體地產生四種重要的作用，一是肯定（recognize）民間醫士的地位，並吸收（absorb）其知識與經驗，為全國所用。二是以制度化的組織與力量，倡導（promote）醫學學術上的研究，和醫學教育的進步。三是主持（sponsor）重要的醫政管理，使醫學系統化，醫療普及化，這在當時幅員遼闊的中國是非政府難竟其功的。四是以其豐富的人力和財力資源，努力傳播與分配（distribute）醫學知識和醫藥物資，以嘉惠地方民衆。這四方面，歷朝太醫院之類的政府機構均發生了或大或小的作用。從業醫者的角度來說，其職業出路（career development）因得朝廷及太醫院的承認而達其嶺峰。院僕的頭銜也常會激勵他們更進一步的研究。對一般醫界或對民衆而言，官方醫士的聲譽與權威固然不比尋常；對醫學知識的傳播、醫療技術的進步而言，其進展與醫者之聲名權勢常是相輔相成，人與事兩方面的發展交相為用的結果對醫學的進步總是利多而弊少的。在兒科醫學上面，宋代錢乙的發跡朝廷，與小兒藥證直訣之刊刻流傳是一明顯的例子。明代龔廷賢、龔信父子，及薛鎧、薛己父子，在醫術、醫書上的發明、表現

23 王緝保嬰全書序，見崇禎閩中刊本，保嬰全書（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善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重印，四冊，1978年）卷首，頁1—11。

，也與太醫院在制度上的功能有不可磨滅的關係，在這方面保嬰全書的地位、內容，是一個最好的見證。

傳統中國政府對醫學發展上的貢獻，其第三層的關係是比較間接的，涉及舊時官紳階級重視倡導、傳播醫學之功。從觀念上說，官紳階級對醫學的關心，與朝廷在理念上並無二致，天子保赤之責，與官紳愛民之心，其理論基礎應該是一樣的。因而前面二個層次所談的政府在重視、提倡、傳播醫學上所可能有的貢獻，下達地方，在官紳階級中亦以具體而微的面貌存在着。前段所述及的嬰童百問，與本節所論到的保嬰全書，其得官方之注意、支持，而得以刊刻流傳，朝廷封疆大臣的提拔擢次，功不可沒。類似的例子，唐宋而明清，不勝枚舉。為薛氏保嬰全書序的王緝銜頒「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敕巡撫南贛汀韶各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職。崇禎年間將保嬰全書較饒重梓的沈猶龍亦為官紳出身。²⁴實際上，若細考目前仍存的傳統中國醫書，依其序言跋語所示，超過大半都是官紳出力的成品。保嬰全書，薛氏幼科的二十卷結晶，如許浩繁之卷帙，如此工整精緻的處理，在帝制中國的環境下，也只有加入「政府」這個背景因素，才足以為之說明。

六、整理與發明——王肯堂的「幼科準繩」

在傳統中國的社會中，一方面從事醫療工作的人種類多，而且程度差距遠——從太醫院裏的醫學博士、醫學教授，到醫士、醫工，乃至流動江湖的鈴醫，有各有他們的功能與顧客。另一方面，對醫學或醫術有興趣的人也不一定是專業醫生，或是以醫療為職業的人（professional physicians）。在這些非專業人士中，對醫學發展影響最大的，要屬私下習好醫學，深諳醫道的儒士了。這些愛好醫學的儒者，自己出身士大夫背景，受過高等教育，成人後或純為個人嗜好，或兼為私自家人親長的需要而投身於鑽研醫術的行列之中。他們能熟讀經史，基本上懂得一套追求學問，整理知識，學習技術的方法，所以學起醫藥來較別人要容易得心應手，加上原本知識水準就高，領悟力強，所以他們習醫不久，當能達到一個相當的程度，就醫學這門專業知識言而言，他們的實力實非「業餘醫生」（amateur medical man）一詞

²⁴ 保嬰全書卷首，頁1—27。

所能涵蓋。

更重要的是，這些愛好醫學的儒士——有些人尊稱他們為儒醫——識見不比常人，他們所閱讀過的醫籍較多，薈集的方書等資料也比較豐富，加上他們思慮審密，為學方法複雜而嚴謹，所以他們成為舊社會裏編彙醫書，整理醫學的最佳人選。他們之中，不少的人有財有勢，很容易利用公私關係，取得官方和民間雙方的醫籍方書。獲得這些材料以後，他們自己固然長年浸淫其間，吸取個人有興趣的醫學知識，同時，以他們終生研習經典的背景，隨着也很容易就動手作些綜合整理的功夫，滙集前一時期官方和民間相關的著作，編成一部醫學的專著，十七世紀初，王肯堂所編審的幼科準繩（1607年）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幼科準繩是一部更大的書——「證治準繩」的一部分，證治準繩又稱六科準繩，是一部內容豐富，涵蓋面很廣的醫書。其編者王肯堂，字宇泰，金壇人。萬曆中年舉進士，選大學士，授檢討，後以京察貶官，終福建參政。其博覽羣書，兼通醫學，是當時衆所皆知的一個事實。

幼科準繩將所有幼醫學的內容分為六門，即初生門、肝臟門、心臟門、脾臟門、肺臟門、腎臟門。²⁵ 觀其分類辦法，即知王肯堂在理論上採信了傳統醫學的五臟論證法。詳考此六門中的內容，則此書實已包括十六世紀末以前絕大部分幼科醫書中所論及的問題，的確是一部相當詳備的幼科全書，其以證治之準繩自期，重點亦在為天下醫家理出一條四海皆準的辨證論治的法則。若以其涵蓋範疇而言，書中對新生嬰兒的養護、新生病變、一般嬰兒哺育、成長的方法及困難都分條討論，對幼兒的營養疾病，也都先列前賢論著再加上自己的判斷，頗有成一家之言的見解。²⁶ 整體而言，王肯堂以非專業醫生的背景，從儒而入醫，先在知識的尋求上日積月累，旁徵博引，逐一考訂推敲，能有這樣精湛的結果，確實難能可貴，難怪證治準繩一問世，立為全國「醫家所宗」。明史傳記中也很推崇王肯堂的成就，認為他是「士大夫以醫名者」中的佼佼者。²⁷

不過，就其性質而言，幼科準繩突顯學院醫學（academic medicine）

25 王肯堂證治準繩幼科，卷七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七〇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6 亦可參考高鐘朗古代小兒疾病新論（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年）

27 見明史吳傑傳，及史仲序，前引書。頁130—132。

之意味稍重，與業醫相比，王肯堂本人既然比較缺乏臨床經驗，對醫理之興趣又濃，所以書中雖亦吸收了歷代幼科業醫之經驗，但作者本身從實證的角度驗證問題的力道仍嫌不足。從這個具體的例子，我們很可以看到醫學與中國傳統的顯學——「儒學」結合的正負雙面意義。儒學經一千多年的繁衍發明，有其博大精深之處，醫學在哲理上臨摹儒學，受其濡染感化，亦可謂體用兼備，架構健全。而且醫學在倫理上，承襲若干儒家重義輕利，仁民愛物的懷抱，未嘗不是一種道德上的昇華。然而以後日的眼光分析，傳統儒學與醫學醫術畢竟在學問本質上，在思想範疇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儒學屬於近代以來所謂的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類，其重點在認識、解決人生哲理，及社會、法政、經濟等相關的問題，醫學為生物科學之一支，在了解並應用對生理、病理等相關知識，以謀人身健康。傳統醫學若不全立基於對生物、病理本身的知識去謀發展，求突破，則不論在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的研究，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王肯堂的幼科準繩刊行於明季，或亦可從這一層意義中思索中國傳統幼科醫學所面臨的盛衰成敗之契機。

七、結 語

一般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學者，在綜觀上古至現代科學於中國文明史的發展過程中，常將其黃金時期置於唐宋，而以明、清兩代為中國科學史之停滯期或衰微期，並以有明三百年間為此盛衰消息之轉捩，此說法多半眩於傳統科學史對中國所謂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科技文明史為標準立論，另一方面也拘於傳統史學界對所謂近代西方科技文明興起之崇拜，對中國遂有相形見絀之嘆。如今檢視此一舊說，雖不能謂其全無根據，然而若要其鑿鑿實實地成立，却有許多個別的問題須要細究。單以本文所涉幼科醫學一支學問立論，明代中國在幼科醫學上的成就承先緒而啓後學，無論在專業化或普及化的方面，都斐然有成，在醫學知識的鑽研，和臨床醫技的發展上，亦有具體的進步，實應謂其跨越唐宋之幼科，而遠遠過之，若以生物醫學亦為科學文明史之一支考量，尤以幼科乃當時中國醫界之尖端學術視之，則有明一代，或近世明、清時期中國科學之生命直不可以「有退無進」一義概之。

再則應指明的是，歷史上醫學之進步與民衆健康之改善從來是相關而不互等的二個現象。此二者的差距於傳統時期較晚近社會尤劇，因而明代幼科

醫學在知識和技術上的進步，固然不可謂與兒童健康福祉之改善全無相涉，但是明朝的幼兒是否都能均沾幼科醫學進步之福，實際上是另外一個問題。如前所述，傳統中國從事於健康服務或醫療工作的人種類很多，上至宮廷太醫，及雅好醫理的儒醫，下至流走江湖的鈴醫、郎中，不一而足。而且我們知道，普遍家庭裏一旦有人健康出了毛病，除了儘量謀求簡便自療（self-medication）或求助於親友鄰坊之外，連同街坊市集的大小的藥舖，乃至巫士扶乩者，都是民衆訪求的對象。當然整體來說，或長期地看，醫學發展與大衆醫療行爲之間多少存在着一種交流的關係，所以一方面醫學知識技術上的進展，經過數十年或上百年，終於由都市而鄉村，由士子而貧民，漸漸地由心口相傳，經驗散佈，會一步步成爲改善民衆健康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民間的疾苦，甚至江湖郎中的秘傳驗方，有時也會因口碑相傳，被採擷、研究，而成爲下一步醫學知識與技術發明之靈感泉源。但是無論如何，在談論明代幼科醫學發展的同時，我們仍然不能不強調此認知上的進展並不代表明代幼兒健康之全面性改善。也就是說明代幼兒健康的實際狀況，本身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值得鑽研的問題，經由對明代幼科的認識，我們只能知道當時醫界對某個幼兒健康上的現象或困難有了如何的了解，或具備何等應付的能力，然而這個客觀上的了解與技能，是要受許多其他主觀及環境因素的影響下，才能發揮其功能。就我們目前對明代社會的認識看來，文中所述及的幼科醫學上的許多成果，也許仍然只有城鎮裏的中等以上家庭的孩子才有機會受益。明代幼科醫學界爲中國幼兒健康作了重要的努力，但是這些成就距離中國兒童健康的整體改善還有相當一段道路。

最後，此文所觸及而不能於文中完全解決的另一個相關問題，是有關中國科技史斷代的老問題。科學史或科技史作爲專史的一種，在中國或西方要如何斷代或分期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而中國科學史在此方面尤其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因爲以往傳統的辦法有二，或者如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等專史一般，依朝代斷代，於是漢代天文史，唐代數學史，明代醫學史好像成了中國朝代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中國天文、曆算、數學、乃至醫學本身發展的歷程，到底與中國歷史上政權的轉移、朝代的更迭有多少直接的關係？其答案也許是否定要大於肯定。單就醫學史而言，除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醫療政策或推動醫療工作一方面之外，醫學在知識和臨床技術上的發展與各朝各代恐怕談不上有太必然的關係。如果學者繼續拘於朝代之名來找題目、作文章，也許對研究方法及成果是項嚴重的自我

設限。長久以往對醫學史真面目的認識，及其背後因素的分析，很可能是一項阻力而不是一個助力。另一種分期的辦法，是更簡略地以歷史階段論為準，粗作上古、中古、近代、現代等若干時期，此斷代的方式，背後同樣是一套對專科史刻板拘泥的框框。單就中國幼科醫學或醫學史的演變過程而言，這個大架子也不是很有益處的一個分期辦法。比較值得考慮的分期辦法，也許是在具體而詳細地探索過某一項特定活動在中國過去經歷的變化之後，依其特質，作出一個對認識該項專史實際上有意義的斷代，譬如說中國醫學的初萌時期、巫醫兩分時期、醫學本身茁壯發展的時期、成熟與紛爭的時期等等。如果依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則幼科醫學在十五世紀初到十七世紀初的兩百多年間，也就是大約相當明朝的時代，確實顯示出該專科正在茁壯成長中所充滿的活力與契機。

Pediatric Medicine in Ming Dynasty China

PING-CHEN HSIUNG

This paper aims at presenting an analytica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hitherto unexplored original resources such as pediatrician's texts, physician's handbooks, child health care manuals etc., the study intends to characterize the growth of this specialized field at its prime during this period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main body of the analysis consists of five sections, beginning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state of child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conditions for the young before the Ming. Following that, the paper utilizes various texts to depict four different aspects of its activities. First, with the emerg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exts such as *One Hundred Questions about Infants and Children*, there was a clear effort to popularize the then specialized branch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Secondly, following the career of physician families such as the Wan family which for generations concentrated on the health needs of children, pediatric medicine reached a new peak of specialization. Thirdly is the fact that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udy and provision of medical care for children, providing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ssistance to the forces at work. Finally, the strong interests among Confucian scholars in studying medicine and compiling medical tests strengthened the academic and empirical nature of the field.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fact that in terms of pediatric medicine, the period 14th-17th Centuries was a time of truly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t is a fact contrary to, and therefore to be reconciled with, the general thesi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a. Furthermore,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el scholars in the field to establish an appre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ased on its own developmental phases rather than in dynastic terms. Following this assumption, the author affirms that pediatric medicine exhibited signs of much exciting growth and maturity during this period.